

# 以史为据 还原一个真实的武则天

——2013中国广元·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论文摘登

## 【编前语】

9月1日至3日，'2013中国广元·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在我市举行。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及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国内各地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研讨会围绕“武则天与广元”、“武则天与武周社会”、“关于武则天的评价”等议题进行认真讨论，以期把武则天研究引向更加深入。今天，本报特摘登部分专家学者论文，以饕读者。

## 玄宗的祭祀和则天武后之关系

金子修一(日本山梨大学教授)

【关键词】玄宗 祭祀 则天武后

一

笔者出版《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的研究》之际，注意到在则天武后驾崩后的中宗朝、睿宗朝的诏敕中，对则天武后并非都是贬义的评价。于是，查阅了唐代诏敕文中用什么词句评价以往皇帝，做出如下归纳。在中宗即位时的《中宗即位敕》(《唐大诏令集》卷二，神龙元年(705)二月五日)中，将武后记为“则天大圣皇帝”。在其后的中宗朝与睿宗朝的诏敕中，尽管没有了称武后为皇帝的词句，但直到睿宗向玄宗让位前不久，可以发现提及武后的诏敕。然而到了玄宗朝，不再看到言及武后的诏敕，因此可认为，玄宗的登基对于如何评价武后构成了一个转折点。并且，玄宗即位后的开元四年(716)睿宗驾崩，与此同时，则天武后的庙号从“天后圣武氏”被改为“则天皇后武氏”。因此关于唐朝如何评价则天武后，也可认为在玄宗朝，特别是睿宗的驾崩构成了一个转机。

而另一方面，玄宗即位后最初的亲祀南郊是在开元十一年(723)冬至。笔者曾对因开辟开元之治而享有盛名的玄宗，为何迟至即位十多年后的开元

十一年才亲郊这一点感到困惑不解。可是如果对则天武后的评价是在玄宗即位后的睿宗驾崩时迎来了转机的话，便不妨认为，玄宗亲政也是在该时期正式实现的。那就有必要重新探讨到玄宗开元十一年即位首次进行郊祀为止的那段过程，特别是开元四年以后的政策活动。笔者曾弄清玄宗朝郊祀、祭宗庙之实际状况，并考察了其意义，但未想到这一问题与退位后的睿宗这一人物相关。因此，目前意识到有必要对玄宗从开元四年至开元十一年年的政策活动重新加以探讨。

七

中宗向睿宗的帝位继承是在毒杀中宗，临淄郡王的玄宗诛杀韦后等异常局势下实现的，睿宗向玄宗让位后，玄宗与太平公主的矛盾日益激化。太平公主被打倒后，睿宗退出了政治舞台，但看开元四年以后的玄宗的行动，可知玄宗从即位当初起就对武后政治持否定性态度，睿宗在世时不敢彻底推行，睿宗驾崩后才积极地贯彻了自己的意志。就这一点来看，中宗朝以后，睿宗在唐代政治史上所起的作用相当巨大，令人意外。至于韦后毒杀中宗，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的动机，似乎也应注意睿宗这一人物而重新加以探讨。

## 论武周政权的历史地位

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五周政权 历史地位

武周政权是指武则天建立的大周政权。这个政权建立于载初元年九月九日(690.10.16)，结束于神龙元年二月四日(705.3.2)，在历史上存在了5252天，即十四年二月另二十五天，约十五年时间。由于武周政权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后来又由唐朝所取代，故人们一般不把它作为一代独立的朝代看待，而是作为唐朝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武周政权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插曲。但因武则天的关系，学术界对这个政权还是相当关注的。自二十世纪以来，曾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过研究，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否定武则天的人往往把武周政权之衰得很快，认为武周时期是唐朝历史上的低谷。说唐朝前期的历史就像一个U字形，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一个高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是另一个高峰，武则天当政的武周政权是处在两个高峰之间的一个低谷。本文拟将武周政权放在唐代的历史长河中进行系统考察，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武周政权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武周时期具有

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不妨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方面把唐太宗的贞观时期、唐玄宗的开元时期与武则天的武周时期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三个时期在体制上是一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局部的改革，而不是全面的革命。大量事实表明，武周时期的政治是比较开明的，为开元之治在人才等方面做好了储备。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先生说武则天“政启开元，治宏贞观”是很有道理的。从经济方面来看，武周时期比贞观时间有了较大的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文化方面，武周时期大胆创新，全面发展，为盛唐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军事方面来看，武周时期维护了辽阔的疆域，扩大了唐王朝在国际上的影响。总之，武周时期虽然很短，只有不到十年时间，但它却是十分重要的。它处于唐朝重要的发展阶段，决不是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之间的低谷。尽管由于它与唐王朝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人们不愿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王朝来看待，但对于它的历史地位，我们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 怎样理解史家对武则天的褒贬

梁永元(原广元市市志办副主任)

【关键词】史家 武则天 褒贬

察事物始终，明盛衰兴亡缘由，扬善戒恶，秉笔直书，引导后世观今鉴古，吸取得失教训，是史家天职。被古今推崇的司马迁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作《史记》故能超过同时代人的思想观念。既按诸侯国到孔子于《世家》，也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于《世家》；既按皇帝立《本纪》，也为临朝称制的吕后立《本纪》。在七十二《列传》里更列有不少少数民族、基层人物。

唐代自玄宗天宝末安史之乱后，逐渐走向衰微，找妇女差池的人相继出现。德宗时的沈既济认为：“吴兢修《唐史》为武则天立《本纪》不宜曰‘上’”。武则天以妇女君临天下不可谓“正”。北宋修《资治通鉴》撰隋唐史的范祖禹也说：自司马迁作吕后《本纪》后世为史者感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本纪》。

除《旧唐书》对武则天做皇帝称“上”外，以后诸史一是不书武则天做皇

帝的大周号；再是不将武则天做皇帝时称“上”只称为太后；三是在武则天《本纪》里将出生年月地删去，如此作是按《春秋》之法示贬抑。但今日读史既要看史家以《春秋》之法贬抑武则天；也要看史家当时所处的社会大背景；更要知道中宗、睿宗及其子孙，文宗等对他们的母皇、尊祖母的称颂。故史家大贬之后，多有画龙点睛大赞扬。

神龙二年(706)正月，则天大圣皇帝入葬乾陵前中宗特命以文章著世的崔融《则天大圣皇帝哀册》。

《哀册文》对武则天的评价是中宗兄弟及公卿大臣都认同的。唐代史家以为有唐立世二百年无此文。

史家既有面对男尊女卑：“牝鸡司晨为家之索”大理论问题；也有面对社会大背景问题；更有修史应“求实存真”的前提，故贬中有褒。今日读史在看史家书武则天擅权篡，任用酷吏，所谓陷害王萧二妃后，作“人彘”及宠幸薛怀义、张昌宗兄弟等过愆，更要看到褒扬她任用贤才，修己安民的精辟论证。

## 论李勣与废王立武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关键词】李勣 废王立武

传世文献是重要的历史资料，而史料正是我们接近历史原貌的必经桥梁。但是，文献等史料本身提供的信息是一方面，研究者的理解是另外一方面，这都决定了文献这种史料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史料不仅提供了历史信息，也提供了历史研究评价的检验标本。通过唐朝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李勣的研究，本文再次遭遇史料与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李勣，原名李世勣，高宗即位之后，避太宗讳而改名。李勣是唐初著名将军，为唐朝统一天下，建立了卓越功勋，凌烟阁功臣谱中赫然在列。李勣的历史贡献多在军事方面，所以《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把他与李靖同传书写，证明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唐太宗晚年曾经评价过李勣的军事，认为他与薛万彻、李道宗这三位当时还能领兵打仗的名将各有特色。褚遂良也曾特殊时刻称他为国家功臣。

李勣是国家功臣、著名战将，这些是

人所共知的，也不具争议性。李勣最具争议性的行为是在废王立武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因为他支持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在关键时刻坚定了唐高宗的信心，并最终取得了废王立武的胜利。但是，李勣在废王立武中的作用，《旧唐书》本传却只字未提，而《新唐书》本传记载的却很详细：

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畏大臣异议，未决。李义府、许敬宗又请废王皇后。帝召勣与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计之，勣称疾不至。帝曰：“皇后无子，罪莫大于绝嗣，将废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宁顾望不对。帝后密访勣，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废。

对比《通鉴》与《新唐书》的叙述，唐高宗召集的会议及各位大臣的反应，《通鉴》比《新唐书·李勣传》记得更详细，而对于李勣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差无几：“他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

## 民间记忆与政治错位

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关键词】民间记忆 政治错位

武则天时期，是城市文化大发展时期，笔记小说的兴盛即是重要的表现，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则天及其以后，大兴科举，洛阳成为政治中心，东都亦设选场，选人一度达五万人，创立殿试和糊名等制度，政治和社会影响很大，也使得文人举子聚集洛阳。

二是开启园林兴造之风——园林豪宅的兴造，开启后世兴造之风之先河，此后有杨氏姐妹的豪宅，洛阳名园的建造，也为这时期的城市文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浓郁城市文人文化的营造——此前寄情于山水，此后流连于坊市。创作出很多城市文学作品(诗歌、笔记、传奇)，主题和题材也更多的适应城市文化需求，也打上更多城市生活的烙印。

四是形成规模的民谚，在城市文人文

化的熏染和推动下，以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作为嘲讽的主要对象和内容，诗歌、传奇也有这种趋势。民谚和榜贴交互呼应，成为城市中下层文化的特色和亮点。也说明即使是武则天时期，虽然存在酷吏政治，大开杀戮之门，但对民间社会的管制不仅没有加强，反而鼓励民间社会参与政治，如设置四面鼓，鼓励民间人士揭发、投诉、提建议，注重提拔中下层士人，因此不少文人也敢于在武则天一朝记录和编撰嘲讽时政，传播和演绎坊间传闻，而并没受到打击和迫害。有人认为武则天一朝经济发展、政治高压，其实我们仔细审视，政治的严酷举措一般是针对权贵阶层，对民间的政治约束并没有出台什么具体举措，反倒是对民间结社的限制比高宗时有所松动。

民间传闻和记载似乎以负面为主，但细分析，负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一是对女主当国的不适应，认为是雌雄失序、阴阳失和的反映；二是对作为男宠之臣二张的嘲讽与愤怒，其实与第一个内容

人！’帝意遂决。”可见，《新唐书》和《通鉴》对于李勣在武后确立一事上的作用，看法是一致的。

因为《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对后世影响巨大，李勣拥护唐高宗废王立武的立场也就成了历史定案。但是，如何看待李勣的这个立场，因为与废王立武的历史意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一历史问题研究的重要关节点之一。

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成为拥护废王立武的代表人物，在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政治对峙中，他们是少数站在唐高宗一边的朝臣，事实证明，他们的存在和努力，为唐高宗最后取得废王立武的胜利是居功甚伟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有二：第一，都是唐高宗的东宫旧部，李勣和李义府甚至更早；第二，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过长孙无忌的排挤。李义府挺身而出帮助唐高宗，完全可以看作是自我保护的需要，不过，如果他和高宗的渊源是受到排挤的原因的话，那么可以说，李义府也确实别无选择了。

最后，我们依然要提及一个问题：许敬宗、李义府在废王立武问题上的表现，是在帮助唐高宗还是武则天？或者说，

是紧密联系的；三是对酷吏政治和腐败奢侈的鞭笞；四是对选举过滥的揭露。《朝野佥载》、《隋唐嘉话》记载则天事迹比较多的，都是属于当朝人记当时事。学者们都认为武则天时期，政治严控，经济放松，但这些来自民间的记载和广泛传播，似乎可以说明统治集团上层和民间政治氛围是不同的，民间基本处于一种比较宽松的状态，严酷的政治，惩治的是：李唐宗室、反对派官僚，地方豪强，并没有出台针对民间或普通百姓的措施。我们反而看到，随着政治的深入人心，特别是城市社会的发展，关注政治、参与政治(主要是以民间的方式)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距离百姓比较遥远，因此武则天时期民间与朝廷的互动和信息交流更为广泛而频繁，民间也更多的参与对时政的褒贬与议论中。

武则天一朝，民间社会相对稳定，下层民变虽屡有发生，但规模不大，政治严控，但没有出台新的如增加赋役等经济

他们是唐高宗的人还是武则天的人？这样的问题几乎是荒诞的，但是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却在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并且一再提示我们：唐高宗如何弱智，而武则天如何野心勃勃。因为他们的先入优势，我们至今要理清这个问题，不仅有许多阻力，而且还要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再回到李勣身上。在关键时刻，李勣表态支持唐高宗，他的行为如何理解才更合理？是因为武则天的出生地与他自己的山东故乡有一致之处？是因为他看到未来的武则天更会重视自己这个新兴的地主阶层？王府也好，东宫也好，从来这些合法且有一定独立性的组织都是政治斗争的基本单位，故吏最容易形成团队战力。唐高宗长期以来对李勣的信任与尊重，唐太宗对李勣曾经有过的托孤动作，包括坚定的忠君观念，还有就是政治利益的计算，这些才是李勣头脑中可能存在的意念。于是，李勣终于说出了那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唐朝政治斗争的一侧天平，立刻被这句话的重量压沉了。

措施，在处理逃户的问题上，采取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和措施。在宗教问题上，也是佞佛而不抑道。

此前对武则天评价的讨论，多集中在上层、文人的层面。本文从民间及中下层的角度审视了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分析民间的舆论与评价。

民间的记载很多也是很客观的，对选举过滥的补救；对酷吏政治下兴起的罗织之风的谨慎(在除掉了最主要的政敌以后)；对民间假借祥瑞等谄媚的明察与宽容；重视文采，大兴科举，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提升了整个社会对文化素养的追求与崇尚，爱才、惜才蔚然成风；

但对佞臣的纵容则未见采取任何补救或反思举措；奢侈之风一直影响到开元天宝。

据孟宪实的研究，高宗时期曾经禁断民间私社，武则天时期则开始松弛，“开始接受民间结社的部分原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武则天一朝并没有刻意加强对民间的控制。

## 武则天与文化中国

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键词】武则天 文化中国

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是立国之本，是中国共识的根。中国是因文化认同和文化共识而形成的，因此，文化中国的灵魂是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多元一体的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由其内部各民族的文化组成的。中华内部各个民族从来不是以血缘和种族来划分，而是以文化的差异特色作为划分的标准。从文明起源时代起，中华文明就因不同地域不同族群而形成满天星斗似的起源地。这些起源地因文化的差异和高低而形成不同的地域和民

族特色。而这些地域和民族特色文化早在几千年前就认同于炎黄与华夏，认同中原文化这个核心。认同华夏与中原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精神动力。

不管其内部政治、军事上的分与合、统一或纷争，即使如魏晋南北朝割据时代，其各地域对文化中国的共识从来没有改过方向，而只有越来越紧密和凝聚，越来越具有向心力，南朝和北朝均以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能成力结束分裂割据时代，成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的精神支柱。“文化中国”共识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持续发展不间断、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独有的现象的奥秘所在，是中国文

化特殊的精神魅力。各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诠释和坚守，作出了自己不同的历史贡献。

武则天是在自汉以来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发展阶段，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涂过一抹亮色的伟大历史人物，是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她对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但由于她的功与过均很突出，历史著作对她的偏见也很突出，所以她对文化中国的贡献反而被今天的研究者忽视了。《旧唐书》对武则天的评价有功有过的肯定，比《新唐书》全面否定的评价要公允。我就从这里说起，《旧唐书》云：“史臣曰：……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疆之儿，羞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武后的阴谋篡君、酷

吏冤狱一面，的确是“不道也甚矣”，但这一面主要是针对唐宗室贵戚及其统治集团的，当然也扩大化了。但她还有“知人安民”的另一面则是值得肯定的。《旧唐书》又云：“泛延谏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解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旧唐书》对武后的尊时宪、听忠言、礼正人、得人心的这一面又是肯定的。这值得肯定的一面，也就涉及到武后对“文化中国”的积极贡献。现在来看，武后临朝称制改国号，改唐为周，复又复唐明辟的前后反复的举动，如果从“文化中国”的视角来解读，应该是为了实现她以“周礼”为号召的文化中国的理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 对广元五代《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碑的校注及相关问题分析

梁咏涛 唐志工(皇泽寺博物馆馆长,馆员)

【关键词】五代 广政碑 校注

《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碑(以下简称“广政碑”)，该碑于1954年7月修筑宝成铁路时，在皇泽寺老大门附近发现的，现存于皇泽寺内，碑略呈长方形，残高94、宽89、厚21厘米，字径2-3厘米，质地为本地所产黄沙岩，碑阳由上至下，从右至左书写，楷书，计29行，碑阴由上至下，从右至左书写，楷书，计25行，碑阳文字横竖成行，碑阴文字多行，横距较疏远，竖行上下文字排列紧密。

此碑自出土以后，六十年代初，中国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明善先生实地考察过。其后，郭沫若先生在研究武则天的出生地时，也对此碑的缺失文字作过相关的增补和研究。到了八十年代，李之勤先生“认为李奉虔就是这次修建武则天新庙的倡议者和主持人。”同时对碑文中李奉虔的籍贯、人物性格及升迁等问题又作了大量的考证，最后，还对寺内历史上有关武则天像的记载作了进一步的梳理，使我们今天再进一步地认识“广政碑”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

由于五代时期割据的时间较短，所以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相对较少，对“广政碑”内容的进一步研究，帮助对了解五代后蜀时期的历史问题有所裨助。在这里，我们对碑文内容整理勘校中，得到一点新的

认识，提出与大家共同探讨。

通过对“广政碑”正文中官职的校补，使我们对碑文中的下半部分已残缺者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碑文中李奉虔的官职和文献中记载之官职比较，可相互补充。从置买的庙产土地和建筑以及日用供器和日用家具来看，五代后蜀时期的统治者对皇泽寺的重建是至今有明确记载的最大、最宏伟的一次。碑文中对武则天及其父武士彟的追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我们认为“广政碑”为利州节度使幕府内丘(兵)马都监孙公、节度判官郭公、观风判官兼供军判官沈公为后蜀时期的昭武军节度使李奉虔建立。从文献来看，李奉虔后期曾做“文思使”、“左右街

坊功德使”职位，前者管理皇室御用器皿制作，后者负责庙宇整兴。再加上后蜀开国皇帝孟知祥为李唐宗室至亲李克佣之侄女婿，李克佣又受李唐宗室恩赦与分封，而皇泽寺又属昭武军节度使治所所在地唯一的纪念李唐“则天皇后庙”的庙宇，李奉虔在利州任职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曾祭于该寺并获灵验。总的来讲，“广政碑”内容充分反映出后蜀时期承袭了李唐文化，无论是职官称谓还是幕府兵制，均无较大变化。

通过以上对“广政碑”的初步梳理，使我们今后进一步在认识、研究晚唐、五代时期社会变革问题时，有了可靠的实物资料。